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 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

Tongzhi Bureau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Local Chronicles

曾 荣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

Tongzhi Bureau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Local Chronicles

曾 荣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 / 曾荣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1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3485 - 9

I. ①民… II. ①曾… III. ①地方志 - 编辑工作 - 历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K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5629 号

·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

## 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

著 者 / 曾 荣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李期耀

责任编辑 / 李期耀 徐成志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57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485 - 9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七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编委会及编辑部成员名单

## (一) 编委会

主任：王京清

副主任：马 援 张冠梓 高京斋 俞家栋 夏文峰

秘书长：邱春雷 张国春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宪群	王建朗	方 勇	邓纯东	史 丹
朱恒鹏	刘丹青	刘玉宏	刘跃进	孙壮志
孙海泉	李 平	李向阳	李国强	李新烽
杨世伟	吴白乙	何德旭	汪朝光	张 翼
张车伟	张宇燕	张星星	陈 甦	陈众议
陈星灿	卓新平	房 宁	赵天晓	赵剑英
胡 滨	袁东振	黄 平	朝戈金	谢寿光
潘家华	冀祥德	穆林霞	魏后凯	

## (二) 编辑部（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任：高京斋

副主任：曲建君 李晓琳 陈 颖 薛万里

成 员：王 芳 王 琪 刘 杰 孙大伟 宋 娜  
陈 效 苑淑娅 姚冬梅 梅 玫 黎 元

## 序 言

博士后制度在我国落地生根已逾 30 年，已经成为国家人才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30 多年来，博士后制度对推动我国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自 1986 年 1 月开始招收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起，截至目前，国家已累计招收 14 万余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已经出站的博士后大多成为各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这其中，已有 50 余位博士后当选两院院士；众多博士后入选各类人才计划，其中，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年入选率达 34.36%，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入选率平均达 21.04%，教育部“长江学者”入选率平均达 10% 左右。

2015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各设站单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服务体系，推动博士后事业科学发展。这为我国博士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

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在内的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央直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领域处于领军地位。为充分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创新积极性，展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优秀成果，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整体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联合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出版博士后成果。经过多年的发展，《文库》已经成为集中、系统、全面反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优秀成果的高端学术平台，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逐年提高。

下一步，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做好《文库》工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锐意创新、发奋进取。为此，需做到：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代实践结合起来，愈来愈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

员应该更加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继续把《文库》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展示、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二，逐步树立智库意识和品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回答时代命题、规划未来道路的使命。当前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愈发重视，尤其是提出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从 2015 年开始，中央已启动了国家高端智库的建设，这对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针对性要求，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文库》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的博士后征集优秀成果，入选出版的著作也代表了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最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因此，要善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大智库功能与《文库》的小智库功能结合起来，进而以智库意识推动品牌意识建设，最终树立《文库》的智库意识和品牌意识。

第三，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里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缺失和建设问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然是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概念、范畴和学科等组成。这一切不是凭空想象得来的，而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在参考我们民族特质、历史智慧的基础上再创造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吸纳儒、释、道、墨、名、法、农、杂、兵等各家学说的精髓，无疑是保持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重要保证。换言之，不能站在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立场搞研究。要通过《文库》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另一方面，要以中国自己的实践为研究定位，围绕中国自己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努力探索具备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在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方面，不断加强和深化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衷心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者和博士后们，以《文库》系列著作的出版为契机，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根本遵循，将自身的研究工作与时代的需求结合起来，将自身的研究工作与国家和人民的召唤结合起来，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是为序。

王京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6年12月1日



## 摘 要

地方志自先秦萌芽，经过汉魏隋唐的编修实践，至宋代其体例基本确定。元以后，地方志的种类日渐丰富，并且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而在地方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近代方志既传承古代方志，又促成现代方志的基本定型，实现了方志的重大转型。

民国通志馆的大规模创办，肇始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行政推动。而通过对奉天、山东、安徽、云南、河南、绥远、陕西、河北、甘肃、热河、上海、广东、新疆、察哈尔、湖北等省市通志馆创办的历史背景、经过与运作样态的考察，系统勾勒民国通志馆兴办的历史概况，探索各省市通志馆同人创新编修模式、形成方志学理论与革新志书体例的历史面相，可为窥探民国通志馆大规模创办背景下近代方志转型发展的历史提供重要支撑。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的局面，为民国通志馆的大规模创办提供了客观条件；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颁布，则为各省市通志馆的创办提供了政策依据与体制保障；而从这一时期各省市通志馆创办与运作的过程可以看出，修志基本上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主持、社会人士广泛参与的格局。

上述修志格局的形成，深刻地影响着各省市通志的编修。加之各地修志因种种主客观因素，在编修模式的选取、修志理念的形或与志书体例的制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使得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过程与影响因子更趋多元，折射出近代方志转型的复杂历史场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段历史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侵华日军到来前的相对稳定时期，故堪称民国

修志的黄金时期，也无疑是近代方志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循着民国通志馆兴办与方志编修开展的历史脉络，探索修志格局形成、编修模式选取、方志理论演化以及志书体例因革的历史样态，无疑是揭示近代方志转型发展内在理路的重要环节。

民国通志馆大规模创办以及各省市通志兴修的局面，因侵华日军的到来而被打破，导致民国通志馆发展进程的中辍。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日军侵华战略的演进下，奉天、热河、河北、察哈尔、安徽、上海、广东、湖北等省市相继沦陷，其通志馆业务也被迫中断，而绥远、甘肃、河南等省志稿编竣后，也因战火侵袭未能印行。可以说，日军侵华造成的社会动荡局势给民国通志馆的运作带来严重干扰和打击，使得近代方志转型的进程历经曲折，民国修志被打上“乱世修志”沉重烙印的同时，近代方志转型的历程也更趋复杂化，由此表现出日军侵华政策的演进与民国通志馆运作的动态调整、伪政权下通志馆的曲折发展、文化抗争背景下方志体例的“似因实创”、“抗战建国”背景下“方志文化”理念的提出与阐扬等历史面相。

近代方志转型的延续，是伴随着民国通志馆的恢复与重建而出现的。从1941年江西通志馆成立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浙江、宁夏、上海、南京、台湾等省市通志馆相继恢复或成立。应当指出的是，这些通志馆大多恢复或成立于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战时修志是其主要的特点，而民国通志馆恢复重建的历史逻辑与后人关于抗战历史的界定并不一致，其背后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通志馆同人对赓续修志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追求，更是时人对“方志文化”价值与重要意义的深刻思考。

“科学方法”应用于修志实践，是恢复重建阶段各省市通志馆运作的一大特色。与通志馆大规模创办时期，方志界注重“方志学”与“科学方法”的理论探讨不同，这一时期通志馆同人多从修志实践中探索“科学方法”的应用之道，他们对旧志的体例、篇目、内容及编纂技术与方法等予以调适和扬弃，大大凸显了方志的科学性和时代特征。这既是方志理论经过充

分研讨后不断沉淀和升华的结果，亦是民国通志馆恢复重建背景下修志实践与理论指导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由于恢复重建阶段的特殊历史背景，这一时期通志馆的运作受到时局动荡与政治更迭的严重影响。一方面，日军侵华的战争威胁在影响着修志业务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通志馆的官方运作背景，决定了其难以避免政局更迭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国民政府派系斗争背景下通志馆的人事纠葛，不仅仅反映了乱世修志的艰难，更折射出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走向。

总之，创建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民国通志馆，经历了抗战前的兴盛、战时的中辍、抗战中后期及战后的恢复重建三个阶段，形成了政府主持创办、学者参与纂修、社会多方互动的修志格局。以民国通志馆为切入点，探索近代方志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背景下的国家意志与地方意识、民族主义与乡土观念、旧的价值系统与新的知识形态、传统修志观念与近代科学方法等，各种复杂关系交相互动的历史场景，既对当前中国新方志编修、地方志系统机制体制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通志馆 方志学 地方志 方志转型

## Abstract

Local chronicles began to appear from the pre-Qin period. After the compilation practice of Han, Wei,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system of Song Dynasty was basically confirmed. After the Yuan dynasty, the types of local chronology we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show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regional feature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ronicles, modern local chronicle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ancient local chronicles, but also promoted the basic stereotypes of modern local history records and realized the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history records.

The large-scal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ngzhi Burea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nefited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promotion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historical process and operation patterns of the Tongzhi Bureau in Shandong, Anhui, Yunnan, Henan, Suiyuan, Shaanxi, Hebei, Gansu, Rehe, Shanghai, Guangdong, Xinjiang, Chahar, Hubei,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Tongzhi Bureau, and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of patterns of compil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innovation of the style of local chronicles, which may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ronicles i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t is true that the formal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by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rovided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the large-scal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ngzhi Burea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utline of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provided the policy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ngzhi Bureau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System security. From the founding and operation of Tongzhi Bureau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attern of government-led, scholar-led and extensive social participation has been formed.

The form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record-setting pattern had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records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of editing mode,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piling the record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format of the records.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ronicles were more diverse, which reflects the complex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ronicles.

What needs to be pointed out is that since it was in a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 and was regarded as the golden ag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also a crucial perio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orography. In the light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Tongzhi Burea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step in revealing the inner logic of the modern local histor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of compilation, the selection of the mode of edi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chorography, and the history style of the chorography.

The situation of large-scal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broken due to the arrival of the Japanese army invaded China, leading to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proclamation hall.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engtian, Rehe, Hebei, Chahar, Anhui, Shanghai, Guangdong and Hubei successively fell into contention. Due to the invasion of the war, the compilation was forced to interrupt, and the draft failed to

print. The social unrest caus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as caused serious interference and blow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Tongzhi Bureau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has led to the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local rec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s compilation has been heavily branded as "Compilation Under the Chaos", and the process of modern local records' transformation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which showed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policy and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Tongzhi Burea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Tongzhi Bureau under the pseudo-regime, the innovation of local records' style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resistance, and the proposal and elab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ocal Records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ronicles is accompanied by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ngzhi Burea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41, Jiangxi Tongzhi Bureau was established, including Tongzhi Bureau in Sichuan, Guangxi, Yunnan, Zhejiang, Ningxia, Shanghai, Nanjing and Taiwan, have been resumed or established. Most of these Tongzhi Bureau were restored or established at the strategic stalemate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China. They we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r logos, while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restoration and rebuilding of the Tongzhi Burea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tradicted the defini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reflected not only the persistent pursuit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ongzhi Bureau, but also the profound thinking of the people on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Local Records Cult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to the practice of compilation was a major featur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Tongzhi Bureau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during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hase. Deferent from compilers paid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Local Recorder Studies" and "Scientific Method" in

the period of the large-scale establishment of Tongzhi Bureau, the people of Tongzhi Bureau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from the practice of compilation, They studied the styles, articles, contents and editing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the old ambitions, which greatly highlighted the scientific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records,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the continuous sublimation of the local records theory after thorough research,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combin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y.

Due to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hase, the operation of the Tongzhi Bureau during this period was seriously disturbed b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threa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history recor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official operation background of the Tongzhi Bureau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avoid political disturbances, and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ecology and political trend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short, the Tongzhi Bureaus found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pre-Anti-Japanese boom, the end of wartime and the post-war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presided o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larship, compilation of scholarship, interactive pattern of the repair. Taking the Tongzhi Bureaus as the perspective of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orography, reveals the national will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nationalism and local concept, old value system and new knowledge form, tra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rastic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t is not only important for us to guide the editing of new local chorography and local chronicles system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but also for our country's cultural system reform and new era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cultural power to provide important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Keywords:** Tongzhi Bureaus; Local Recorder Studies; Local Chronicles; Local Recorder Transformation



#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历代修志与方志转型的发端 .....	20
第一节 历代修志及特点 .....	21
第二节 方志理论的发展 .....	31
第三节 方志转型的发端 .....	39
第二章 志馆兴办与修志格局的创新 .....	48
第一节 通志馆创办热潮 .....	49
第二节 政府主导、学者主持、社会参与 .....	102
第三节 编修模式、方志理论、志书体例 .....	120
第三章 战时修志与方志文化的形成 .....	170
第一节 战时通志馆的艰难运作 .....	171
第二节 体例因创与文化抗争 .....	208
第三节 抗战建国与方志文化 .....	215
第四章 战后重建与方志转型的延续 .....	231
第一节 通志馆的恢复与重建 .....	232
第二节 方志文献与科学方法 .....	250
第三节 经费短缺与人事纠葛 .....	265